



风雨五载

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

孙耀文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风 雨 五 载

—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

孙 耀 文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孙耀文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0

ISBN 7-80109-140-X

I . 风…

II . 孙…

III . 莫斯科中山大学 - 历史

IV . G649.5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558 号

风雨五载

孙耀文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刷：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30 千字 **印张：**14.5

版次：199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8.6 元

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

世界历史研究所孙耀文同志所著《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一书，是作者多年刻苦研究的成果。该书以当时国内外多变的形势为背景，叙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曲折历史，并以中山大学为典型深入分析了共产国际、苏联同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阐述了该校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历史作用。这本书填补了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是一本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鉴于目前出版学术专著常有经费上的困难，希望能够给予一定的资助，使有益的学术著作的出版能得到物质上的支持。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研究员 郑 惠
1995年8月5日

从事共产国际历史和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同志都懂得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这所学校既培养出中国共产党的一批第一代领袖，也产生了以王明为首的

左倾宗派集团，而且还为中国国民党培养了一批领导骨干，因此它无论从积极意义上讲都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是应当充分给予重视和认真研究的。近年来国内外都出版了不少直接、间接与中山大学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回忆录等等，使我们有可能对它有较好的了解，但迄今仍没有一本系统地深入地记述这个机构的历史和作用的研究专著。我读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孙耀文同志写的《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一书的稿子后，感到它确实弥补了这一缺陷与空白。该书是在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方针的发展变化的背景下来论述中山大学的历史的，因此比较深刻地揭示了苏联共产党党内斗争对于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共党内斗争的影响，对一些重要史实作了说明，对一些史实错误作了纠正，是一部有相当深度的研究著作。如能出版，对于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都会有较大帮助，因此我特为之郑重推荐。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
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研究员 殷叙彝
1995年8月6日

前　　言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中国青年到外国留学，有学现代科技的，有学救国道理的，其中不乏杰出人才。但由外国创办、专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学生也只招中国人，在世上实属少见。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在这所大学学习过的中国人，对中国现代革命、现代政治与文化都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若问这所学校的名称，那便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为说明莫斯科中山大学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我们不妨略举数例：

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的 12 名代表中，有 2 名代表后来是这所大学的学生；1921 年已是中共党员的数十人中，就有好几人到该校学习。

在此学习过的学生中，有好多人后来在中共中央占有重要地位，如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董必武（曾任常委）、林伯渠、叶剑英（曾任副主席、常委）、王稼祥、乌兰夫、杨尚昆，还有先后在中共中央“总负责”（也常称总书记）的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以及代理过几个月总书记的陈绍禹（王明）。

在 1945 年中共“七大”选举中，这所学校的回国学生在 44 名中央委员中占 9 名，在 33 名候补中共委员中占 4 名。在

1956年中共“八大”选举中，他们又在97名中共委员中占14名，在7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还占8名。他们之中有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有多名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这所学校的许多归国学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功勋卓著，风范照人。他们多数人虽已作古，但光辉业绩永存。在1949年前，还有很多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牺牲，长眠九泉，如何叔衡、马骏、曾中生、左权、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陆更夫、陈复、陈原道、黄励……他们的英名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为中国的民主、进步和富强作出贡献的中国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中，有的也曾经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如屈武、刘仲容、李文宜……。冯玉祥将军和邵力子先生都曾是该校的“名誉学生”。

许多读者熟知的王明，正是从这个学校发迹的，以他为首的教条宗派（即有名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也是在这里形成的，它后来一度占据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

中国现代史上出现过的托派（即托陈取消派），最早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冒出来的。

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招收过不少国民党员学生。他们之中最出名的是蒋经国。国民党中有一些高层人物，如谷正纲、谷正鼎兄弟、郑介民、邓文仪、张镇、康泽等，都曾是该校学生。此外还有任卓宣（叶青）一类人。

不难看出，莫斯科中山大学确乎非同一般，这是一所集众多名人于一处的名校。这所名校有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有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有曲折的内外斗争历程，还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作者试图全面阐述这所著名学校由创办至结束的全过程，

对上述问题作一番寻根究底的研究，探索其中的种种根由和奥秘。

作者深知，详细描述这所名校的历史，描述这些名人学生的不凡经历，必定涉及中国全部现代历史，而且要相当多地谈论苏联的历史。不过，作者不想全面展开论述，而只求简要地描绘学校的发展概貌、校内纷争的来龙去脉、著名学生在校内和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活动与作用，以此作为本书的主要内容，并在必要时涉猎比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以使读者获得较为全面的了解。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作者为了尽可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历史实貌，下功夫在几年内广泛搜集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并作了认真考订。可能接触到的历史文献，在书中已充分使用；对大量回忆录做过反复考查与比较；同时注意研读国内外有关历史专著、论文，吸取有益研究成果。

作者希望本书能为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勾画出正确图象，让广大读者，从专家、学者到各界青年朋友，了解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历史全貌及众多学生的不同经历，从而对了世界和中国的昨天有所裨益，悟出一些有益的历史经验。作者相信本书会给读者朋友带来浓厚的兴趣。

目 录

前言	I
第一章 一所名校的诞生	1
第一节 创建	1
第二节 选派首批学生	9
第三节 赴莫斯科之路	29
第四节 第二期中国学生到苏联	44
第二章 伏尔洪卡十六号	54
第一节 新活动天地	54
第二节 校长与学校机构	62
第三节 新式课程和编班教学	68
第四节 中共旅莫支部的成立与解散	76
第五节 国共两党学生的联合与斗争	87
第六节 国民党要人与名誉学生	97
第七节 志向、勤奋与学业	105
第三章 国内形势剧变激起校内大波澜.....	115
第一节 由振奋到震惊.....	115
第二节 斯大林到校批判拉狄克.....	122
第三节 “七·一五”事变前后的中山大学	129

第四节	接待宋庆龄等来访	135
第五节	米夫得势当校长	141
第六节	国民党学生分批回国	149
第七节	共产党学生回国投入战斗第一线	158
第八节	转校与留校	166
第四章 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72
第一节	来自国内第一线的新学生	172
第二节	合并与改名	181
第三节	新的编班、学习与生活	195
第四节	深孚众望的“老头子班”	205
第五节	莫斯科中山大学内的托派分子	214
第五章 陈绍禹宗派在校内的活动		233
第一节	米夫扶持下的陈绍禹宗派	233
第二节	“江浙同乡会”冤案	247
第三节	中共“六大”与莫斯科中山大学	257
第四节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反“右倾”波及校内	268
第五节	所谓“第二条路线联盟”	272
第六节	短兵相接的十天大会	287
第六章 从“清党”到学校停办		301
第一节	严酷的“清党”	301
第二节	打击迫害中共代表团	320
第三节	回国与流放	328
第七章 归国以后		341
第一节	王明教条宗派篡夺党中央领导权	341
第二节	艰难岁月，顽强斗争	355
第三节	在长征中	390
第四节	在抗日战争年代	401

第五节	在解放战争中	411
第六节	新中国的栋梁	417
第七节	走在不同的政治道路上	428
简短结束语		445
后记		449

第一章

一所名校的诞生

第一节 创 建

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建于 1925 年，由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建立，它的任务是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培养干部，因而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十分有名的学校。人们至今仍对它怀有极浓厚的兴趣，谈论着有关它的种种纠葛与是非，谈到它的众多学生的不同经历与评价。

五四运动后中国一些先进青年(也有少数已是中年)怀抱满腔革命热忱出国留洋，一是去法国等西欧国家勤工俭学，一是到苏联去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不少领导人和重要活动家，早年曾出国留学，热心地探寻中国的解放道路。

当时到法国等西欧国家去的知名人物很多，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李维汉（罗迈）、李立三、王若飞、向警予、蔡畅……他们大多在法国参与建立少年共产党，后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立了中共旅欧总支部。此时已是著名川军将领的朱德也在1922年到德国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德国留学的还有孙炳文、徐冰（邢西萍）等人。

到苏联去学习的也有不少著名人物，如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叶挺、萧劲光、任作民等等。在1925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员到苏联学习，通常都是进东方大学。刘少奇、任弼时等就是1921年初首批直接由国内到东方大学学习的。

从1923年起，原先在法国等地勤工俭学的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陆续分批转到苏联入东方大学，如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王若飞、刘伯坚、萧三等。朱德由德国到莫斯科后参加了军事学校开设的实际工作短训班，深入研究军事。聂荣臻先进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随后又到苏联红军学校特设的中国班深造。原先留法勤工俭学的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后来也由法国转到苏联学习，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已经成立，便进了这所新学校。

在以往的一些著作、文章和回忆录中，有的把苏联东方大学同莫斯科中山大学混同起来，似乎两校就是同一学校，有的把两校简单连接起来，似乎东方大学就是中山大学的前身，中山大学一开办，东方大学就停办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是两所学校，不是同一所学校的 different name。在中山大学开办以后，东方大学仍在招收中国学生，两所学校中同时有中国学生在学习。东方大学中国班合并到中山大学是1928年（即三年后）的事。这两所学校既有不同，又有密切关系。

据 1921 年初同刘少奇、任弼时一起第一批入东方大学的萧劲光回忆：“东方大学是 1921 年成立的，它的全称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是一所政治性的学校，来学习的大部分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也有一部分是远东各国来的学生，有中国、日本、朝鲜等”。“我们在中国班学习”^①。

1926 年 11 月入东方大学的张仲实回忆说：“东方大学——全名是‘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大’是我们中文的简称。共产主义大学是党校性质的，共有三所，即‘东大’；西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只招收国内学生。‘东大’设两部：一是国内部，招收苏联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的学生，有乌兹别克班、哈萨克班、格鲁吉亚班等等；二是外国班，招收苏联境外东方各民族的学生，有中国班、日本班、印尼班、伊朗班、土耳其班、蒙古班等等。”^②

萧劲光、张仲实回忆所述是符合实际、真实可信的。张仲实提到的该校名称冠以斯大林的名字，则是因为东方大学原属于苏联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领导，而斯大林是这个部的人民委员（即部长）。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东方大学的确始建于 1921 年上半年，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俄文名为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Востока，缩写为 КУТВ）。在此之前，第一所共产主义大学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于 1920 年底设立为民族地区培训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三月短训班。为多给东部地区培养干部，全俄中央执行

① 萧劲光：《赴苏学习前后》，载《革命史资料》第 3 辑。

② 张仲实：《二十年代赴莫斯科留学的回忆》，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 年第 10 期。

委员会于 1921 年 4 月 21 日决定将短训班改建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东方大学开办之初不仅为苏俄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而且对中国、朝鲜、蒙古、伊朗、土耳其、阿富汗的革命者、侨民开放，为国外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工作者。学校起初建立了七月训练班，从 1922—1923 年学年度起开始三年制教育。1921 年至 1926 年上半年，东方大学由民族事务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Г.И. 布洛伊多领导。教员之中有 П.А. 米夫和 В.Н. 库丘莫夫，这两人后来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活动家瞿秋白曾在东方大学担任翻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也多次和中国学生会见。1922 年时学校中已有 42 名中国学生^①。

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后来逐渐增加。正如张仲实所说：“在中山大学成立以前，中国同志不论从国内去的或从欧洲（在法国、德国留学的）转去的，进的都是‘东大’”。在 1926 年下半年，“‘东大’中国班有两个学习班：一个是工人班，大部分学生好像是从上海去的工人；一个是普通班，全是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是在法国、德国的留学生。两班总共三四十人。我进的一个班是新设立的，这个班有十四五个人，全是刚从国内去的。1927 年二三月间，‘东大’又成立了一个班。这样，1927 年上半年在‘东大’的中国同志，共有四个班，合计七八十人。”他还指出，在‘东大’学习的中国同志全都是中共党员，并且都是在国内作过一点实际工作或党的工作的。

显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以前和成立之后，都有一批中

^① H.H. 季莫菲也娃：《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载苏联《亚非人民》1976 年第 2 期。

共党员入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到 1927 年上半年，进东方大学的中国人前后在百人以上。但是，这样的人数远远赶不上中国国内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对干部的急需。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苏联领导人又特别看重国民党，当然不满足于单单培训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人才。因此，苏联单独创办一所为中国革命同时培训国共两党干部的学校，便很快提上了日程。

不懈奋斗约四十年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国民党著名领袖孙中山，终因积劳成疾，不幸于 1925 年 3 月 12 日逝世。

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援，苏联和共产国际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全新的大学。这所学校就以刚刚逝世的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苏联帮助创办的黄埔军校，主要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军事干部，而培训懂得革命理论、从事革命政治工作的大量政治干部的任务，就落在这所新办的中山大学肩上。

苏联为建立中山大学进行了积极筹备。校董事会不久即成立，由著名外交家、曾任苏俄驻华代表的越飞任董事会主席，成员有将出任校长的拉狄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布哈林，苏俄副教育人民委员、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等著名人物。

这个由七人组成的董事会是个理事会，实际上是当时为创办中山大学而在苏联成立的广泛群众团体中山大学促进会的中心，同时也是学校的领导机构。中山大学促进会立即开展工作，发动和组织苏联各界为创办这所新学校提供支持。据前苏联学者 Г.В. 叶菲莫夫记述，这个促进会的会员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机关，他们缴纳规定的会费。根据会章，它应当吸引苏联公民入会，并推动他们积极参与以下工作：举行集会，组织收费讲演，举办音乐会、晚会和出版刊物。促进会的经费来自于机关会员

的资助、会费和捐款，以及讲演和出版刊物的收入^①。

被任命为校长的拉狄克为创建中山大学作了很大努力。据第一批入校的一个学生回忆说，拉狄克“责任心很强。只给他三、四个月时间来建立中山大学，而就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每一件事都组织得井井有条。连来中大的第一批学生到达时，都觉得象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苏联是在它的经济刚有所恢复之时，就为创办莫斯科中山大学提供最大支持的。尽管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有关学校经费来源的确切资料，但盛岳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提出的推断，应当认为是有道理的。他说：

“中山大学和大多数公私立大学迥不相同的一点在于它的办学经费来源从不公诸于众。事实上，确切的年度经费及其来源至今仍然是一个秘密。中山大学同其他大学不同的地方还在于，它不向学生收学费，而且对所有的学生都免收膳宿费，甚至还发给服装和零用钱”。“我怀疑，中国即使对它有所支持，实际上也拿不出这一大笔钱。正如我在当学生时就推测过的那样，中山大学的全部财政负担全落在俄国人身上，是他们首先建议创立了这所大学并为它配备了教职员的。”

他分析说：“如果国民党能负担中山大学的费用，为什么中山大学设在莫斯科而不设在广州呢？”他还曾请友人查阅国民党中央保存的档案，但对此也一无所获。据此他认为：“看来绝对找不出任何记录，说明国民党曾为中山大学提供过财政支

^① Г.В. 叶菲莫夫：《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历史概述》，载苏联《远东问题》1977年第2期。